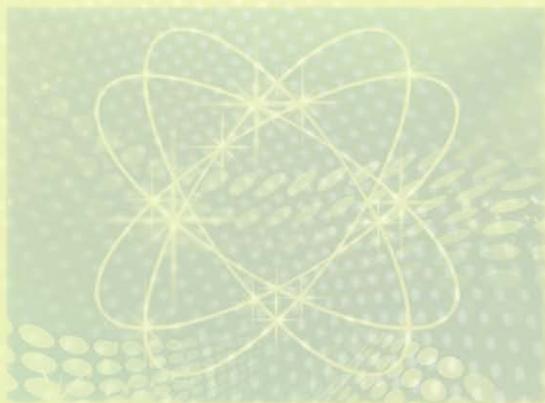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
“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黄立敏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论丛

总主编 丁煌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
“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黄立敏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黄立敏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

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论丛/丁煌总主编

ISBN 978-7-307-10520-1

I. 社… II. 黄… III. 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深圳市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109 号

责任编辑:张欣 责任校对:王建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3 字数:185千字 插页:3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520-1/D·1216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公共行政”是英文“Public Administration”一词的汉译，在我国大陆地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上的联想以及对“管理”问题的重视，人们在传统上也习惯于将其称为“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管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增设，尤其是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项目在中国的设立和发展，也有人将其译为“公共管理”。

作为一种专门以社会公共事务为管理对象的社会管理活动，公共行政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世界，自古都不乏公共行政的思想。然而，这些早期的公共行政思想因缺乏系统化和理论化而尚未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公共行政真正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然后迅速扩及西方各国的，其产生的公认标志便是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在《政治学季

刊》上公开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公共行政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行政学研究》一文。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公共行政学在西方历经初创、演进、深化、拓展等主要阶段的发展历程，日渐成熟，迄今已经成为一门既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不乏重要的实践价值的综合性学科。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起步相对较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从根本上来说实属“舶来品”，而且，公共行政学在我国的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发展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的政府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学术研究体制更多地是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它们高等学校公共行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基本上是对英美相应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沿袭和移植，尤其是它们的专业师资队伍和学术研究队伍大多要求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他们基本上可以及时地了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地讲，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共行政学一直都处在对英美公共行政学的跟踪发展过程之中，其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水平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是很大。

在我国大陆，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从我国国情和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出发，对改善我国的行政管理状况作出了巨大的艰苦努力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却在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与某些学科一样被撤销了。实事求是地讲，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影响了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历史积累和发展，更影响了我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客观地说，在我国大陆，关于公共行政的学科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公共行政学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勃兴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谈到了至今中国政治和行政学界依旧难忘的一段话“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

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恢复和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成立,酝酿了恢复和发展公共行政学的氛围,一些研究者开始公开撰文呼吁和讨论有关公共行政学的问题。1982—1984年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科学行政管理理论指导的缺陷,则对恢复和发展公共行政学提出了现实要求。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恢复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自此,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当时的劳动人事部在吉林联合召开了行政管理学研讨会,发表了《行政管理学研讨会纪要》。9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号召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并于该年年底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进而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局面。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并且选定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作为试点高校,并于1986年正式招生。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的热潮,不少大学和研究单位也相继设置了行政管理学专业或开设了行政管理学课程,同时成立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学甚至被视为我国几千万党政干部的必修课程。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并且发行了会刊《中国行政管理》,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获得公认并明确肯定下来,也标志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初战告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以加速度的节律迅速发展,表现为学科体系、学科分化、应用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尤其是研究领域开始触及世界公共行政研究的某些前沿问题。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对公共行政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回眸中国公共行政学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无论是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

研究成果的引介，还是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现实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迄今为止，不仅基本上确立了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取得了斐然的科研成果，而且还形成了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多层次的相对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鉴于公共行政学在西方起步较早且有长期的理论积累，而且，在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公共行政过程中，公共政策愈来愈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通过改变社会公众的预期而激励、约束、引导着其行为；通过制定和实施特定的行为准则而改变、调整和规范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解决公共问题而维护、增进和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正是通过公共政策的有效运作，社会公共生活才能保持稳定和谐的发展局面。不管是在哪种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不仅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公共行政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而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我国最早开办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之一，我所在的武汉大学较早地在其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设置了比较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上，为了拓展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国际视野”和坚持行政管理学科研究的“政策导向”，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比较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这两个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在业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不少学生已经成长为公共行政实务部门的中坚力量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本学术论丛所结集出版的研究成果便是我培养的部分博士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向地方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和放权，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走样”等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执行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已经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定明捷博士的《转型期政策执行治理结构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一书以“政策执行鸿沟”为对象，以理论分析为起点，以实证研究为支撑，以交

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具，以乡镇煤矿管制政策为研究案例，借鉴和吸收委托代理、资源依赖等理论观点，详细分析了“政策执行鸿沟”产生的内在机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是如何选择不同的治理结构来消解“政策执行鸿沟”现象的，着重阐释了中央政府选择治理结构的理论依据及其效果。该书的研究表明，虽然转型期频频出现“政策执行鸿沟”现象，中央政府仍然有能力应对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被中央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策领域。而且，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治理结构调整方面的不完善之处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协调是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前提，政府组织更不例外，协调的缺失不仅会导致政府组织产生功能和权力及资源等碎片化，而且更会产生信息不对称、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孤岛现象及信任危机等阻碍政府组织整体性运作和绩效提升的棘手问题。曾凡军博士的《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协调机制研究》一书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当代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整体性治理及其相关理论为分析工具，基于对政府组织协调困境之表象和生成机理的阐释和对政府组织协调困境之救治策略的勾勒，建构起由整体性结构协调机制、整体性制度协调机制和整体性人际关系协调机制组成的整体性政府组织协调机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兵团体制愈来愈面临着新的挑战。顾光海博士的《现代组织理论视阈下兵团体制转型研究》一书以理论分析为起点，以实证研究为支撑，以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自然选择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以组织同构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发生机制、成长机制以及转型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作者在广泛的实证调查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认为，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性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载体，尽管兵团

的特殊体制会伴随着其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而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但是这种体制需要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兵团体制的转型要在保持兵团基本体制大框架不变的原则下进行，兵团体制应从宪政制度、功能重心、组织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造；特别建制地方政府模式可以成为兵团体制转型的方向选择。

湖泊水污染防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更是一个典型的跨域公共治理问题。叶汉雄博士的《基于跨域治理的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研究》一书以位于武汉城市圈腹地的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对当今世界日益增多且错综复杂的跨区域、跨领域、跨部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问题进行了颇具价值的探讨。作者基于对跨域治理理论的系统梳理，客观地描述了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的现实状况，深入地剖析了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困难的根本原因，正确地借鉴了国内外湖泊水污染防治的成功经验，系统地探讨了梁子湖水污染跨域治理的对策建议。作者沿着“现状——原因——对策”的逻辑主线，通过对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的实证研究，全面地阐释了跨域公共事务在治理主体、治理信任度、治理合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跨域公共治理问题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各类安全事故此起彼伏，人员伤亡极其惨重，这一严峻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形势不仅引起了政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形成了学界的研究热潮。郑雪峰博士的《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创新研究》一书以我国现阶段严峻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形势为背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从组织结构设置、职能划分、权力配置和行政运行机制等四个维度，全面梳理了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变迁历程，客观描述了现阶段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由戴维·菲尼总结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给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创新的制度需求因素和制度供给因素以及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变迁的内在动力、变迁主体、变迁方式及变迁过

程，进而科学地提出了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新体制的制度设计框架及其具体实现路径。

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了加速期，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市化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出口，内需不振的问题。洪隽博士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产品价格管制研究》一书基于对城市与城市化概念的内涵界定和对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阐释，得出了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主要问题，进而引申出价格管制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随着广大市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政府可以通过科学的价格管制来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及服务质量的改善，科学的价格管制能够有效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运用差别价格政策可控制和平衡有效需求。在作者看来，价格管制属于政府经济性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公共产品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博弈论以及激励性管制理论等，用者付费则把价格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作者力图从公共管理而不是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价格管制问题，他不仅提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需要双向思维——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减少有效需求等创新观点，而且强调指出，只有发挥价格机制在城市基础设施、公交优先、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加强成本约束，才能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改居”社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村改居”社区如何治理，不仅成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更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核。黄立敏博士的《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一书是运用当代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村改居”社区治理的一项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尤其是对于以“差序格局”和熟人关系网络为特征的“村改居”社区具有天然的契合，社会资本是“村改居”社区中最重要的传统因素，它

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的“村改居”社区在其社区治理体制变革前后变化的实证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在“村改居”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如何发生影响和作用，“居站分设”模式下社会资本出现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哪些影响，进而揭示过渡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最后得出结论：保持“村改居”社区社会网络，借助“村改居”的社会资本，加大对“村改居”社区建设的投入，实行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组织共治，是“村改居”社区推进公众参与和节约政府管理成本，实现社区善治的共赢途径。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这套学术论丛中各位作者的博士生导师，一方面，我为他们顺利地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尤其是能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另一方面，我所能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基于我职业经验的“两方”指导，即“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指导，至于每一篇博士论文的主题研究领域，具有专门研究的各位作者才是真正拥有“话语权”的“专家”，我衷心地祝愿各位作者继续在各自的专长领域不懈努力，取得更多、更辉煌的成就！

最后，作为这套学术论丛的总主编，我非常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领导王雅红女士以及胡国民先生等各位编辑为本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宝贵心血；我还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批评意见，以推动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作为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名学者，我坚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公共行政学必将在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等方面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显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丁 煌

2013年元旦于珞珈山

前 言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变成城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改居”社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类“非农非城”、“亦城亦村”的过渡型社区如何治理，成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本书是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选题的缘起、意义和本书的框架；第二章是介绍本书的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第三章是社会变迁中的“村改居”社区，主要介绍“村改居”社区产生的背景和它的特征；第四章是村民自治模式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主要解释社会资本在治理中所起的作用；第五章是“居站分设”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及社会资本变化；第六章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目标与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尤其是对于以“差序格局”和熟人关系网络为特征的“村改居”社区具有天然的契合。在本书中，社会资本是被定义于存在于特定共同

体内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特征。根据这个定义，笔者认为，熟人关系网络、乡土信任和社区规范构成了“村改居”社区的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城市化虽然使得村落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传统因素在现代化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是“村改居”社区中最重要的传统因素，它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的“村改居”社区在其社区治理体制变革前后变化的实证研究，考察和研究在“村改居”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如何发生影响。“居站分设”模式下社会资本出现怎么样的变化，又造成怎样的影响？进而揭示过渡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最后得出保持“村改居”社区社会网络，借助“村改居”的社会资本，加大对“村改居”社区建设的投入，实行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组织共治是“村改居”社区推进公众参与和节约政府管理成本，实现社区善治的共赢途径。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是一个新的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虽然政治、经济因素是解释社区治理变革的主要变量，但是影响“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因素是多元的，“村改居”社区中蕴藏的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种分析途径，社会资本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于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因素的重视，促进人们从更深的理论层次关注隐藏于“村改居”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信任、合作、互惠互助、规范与参与网络等的社会资本形式，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些社会资本对于“村改居”社区治理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人们找到当前“居站分设”模式下“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有助于人们找到适合“村改居”社区实际的治理之路。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1
二、国内外既有研究综述	6
三、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16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实地的选择	27
五、本书的难点及创新点	30
第二章 本书的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	32
第一节 社会资本的界定	32
一、布迪厄：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	34
二、科尔曼：结构功能的社会资本	36
三、帕特南：治理绩效的社会资本	38
四、其他人的社会资本观：林南、福山及其他	39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41
一、社会资本的特征	41
二、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43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契合	47
第三章 城市化过程中的“村改居”社区：背景描述与特征分析	52
第一节 “村改居”社区出现的背景	52
一、城市与城市化	52
二、深圳的城市化	57
第二节 深圳市宝安区概况及城市化后社区分类	63
一、深圳市宝安区概况	63
二、城市化后宝安社区分类	64
第三节 宝安区“村改居”社区的特点	67
一、自然特点	67
二、社会特点	68
三、社区组织特点	70
第四章 村民自治模式下“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73
第一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历史传承	74
第二节 “村改居”社区的村落单位化	77
一、单位的起源及其特点	78
二、村落单位化	82
第三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87
一、熟人关系网络：社区认同的前提	87
二、乡土信任：互惠合作的基础	89
三、村规民约：彼此认同的规范	91
四、非制度性权威：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95
第四节 “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97
一、“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	97
二、“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治理效率	99

三、“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实现监督的日常化，降低监督费用·····	101
四、“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通过促进村民间的合作，增进社区的公共利益，促进社区发展·····	103
第五章 “居站分设”模式下“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及社会资本变化·····	105
第一节 社区治理模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居站分设”·····	106
一、制度变迁的模式比较·····	106
二、宝安“村改居”社区治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107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利益相关者的现实选择·····	113
第二节 “居站分设”的过程分析·····	118
一、“盐田模式”的影响·····	118
二、宝安区“村改居”社区“居站分设”的实施过程·····	120
三、具体案例分析·····	122
第三节 “居站分设”模式下社区困境及社会资本变化分析·····	127
一、“居站分设”模式下社区治理困境·····	128
二、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困境解读·····	140
第六章 深圳市宝安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目标与路径选择·····	153
第一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目标·····	154
一、善治·····	154
二、重建社会资本·····	158
三、增进社区公共福利·····	158
第二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原则·····	159
一、从实际出发原则·····	159
二、政府主导原则·····	160

三、多中心原则·····	160
四、自治原则·····	161
五、渐进原则·····	161
六、政府职能转变原则·····	161
第三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162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	162
二、不同治理模式的治理环境分析·····	163
三、宝安区“村改居”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166
第四节 “村改居”社区治理路径选择·····	170
一、在治理模式上，实行社区内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 多组织合作共治·····	172
二、在治理投入上，加大政府对“村改居”社区建设的 扶持倾斜力度·····	173
三、在治理手段上，充分挖掘利用并培育社区 社会资本·····	175
四、在治理方式上，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 工作社会化·····	176
五、在治理主体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加强 治理网络建设·····	178
六、在治理基础上，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热情·····	179
参考文献·····	181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190
后 记·····	191